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经济外交：全球竞合新动向

□徐剑梅

经济外交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概念，据学界考证，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由日本岸信介政府首先提出的。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难以施为，便在经济上大做文章以拓展外交空间。这一概念迄今无权威和统一的定义，但粗略说来，国际交往中，以经济手段达到外交目的，以外交手段达到经济目的，抑或二者兼具，均可纳入经济外交范畴。

自古有邦国即有外交，有外交其实即含有经济外交的成分，中国远追春秋管仲，西方直溯希腊罗马。但现代意义的经济外交，公认始自民族国家崛起之后。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经典案例。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迅猛推进，各国普遍转向经济层面的竞争，日益注重以外交促经济促发展。2013 年中欧光伏争端的和解，领导人亲自推动的经济外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第 5 年，各个领域的国际竞争都在加剧，经济外交高度活跃。从全球层面来看，经济外交的竞合博弈正在“ 升级换代 ”，手段与目的都在跨界、融合，而最富经济活力和政治复杂性的亚太地区，已成经济外交的最前沿。这一趋势在未来数年将更加清晰。

2013 年多国经济外交强势出击

2013 年的全球经济外交，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多国强化了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合博弈中，经济外交与安全、政治、军事等议题的互动更密切，全球经济外交更加借重金砖机制、G20 峰会等多边平台，更多元、更宽广。

2013 年 1 月底，约翰 · 克里被提名为美国新任国务卿。他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阐述其未来 4 年外交构想时，断然宣称“ 经济政策即外交政策 ”，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仅仅定义为无人机和军事部署，全世界都在竞争资源和市场，美国如果不愿投入这些领域，只会自我削弱。美智库亚洲学会当即把克里的表态称为“ 外交新思路 ”。

2013 年是俄罗斯“ 入世 ”元年。据俄外交部外交学院教授马克 · 奈马克撰文介绍，克里姆林宫在 2013 年外交构想中，首次把俄外交政策的经济方面概括和具体表示为“ 经济外交 ”，并提出新的目标——巩固俄在欧洲与亚太经贸联系中关键的过境国地位，新的重大地缘政治措施——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岁末，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与欧盟“ 拔河 ”成功，经济外交告捷。

梳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一年来的出访路线图，不难看出，经济外交和围堵中国是其主要着力点。2013 年 4 月访问俄罗斯和中东时，安倍就盯住日本的能源稳定供给与核电和医疗技术出口，期望打响“ 经济外交的第一发炮弹 ”。为围堵中国，安倍游走东南亚，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 对东盟大把大把撒钱 ”。仅 12 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安倍便宣布今后 5 年内将为东盟提供总值 2 万亿日元经援，另与东盟十国均签署了投资协议。日本《朝日新闻》说，安倍“ 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 ”，“ 但能否给日本带来实惠，却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显然已摆出在东南亚地区全力进行经济外交的姿态，并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确定位为中国。

2013 年 11 月底，加拿大政府向外交人员发布新训令，主题词即为经济外交，要求所有驻外人员以推动国家商业利益为第一优先要务，重中之重是改善加拿大在新兴市场贸易及投资的不足，5 年内将在中国、印度及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小企业数目增加一倍。加国际贸易部长法斯特说，如果这一五年计划成功，加拿大能创造 4 万个与外销有关的新工作。

2013 年英法经济外交的“ 王牌亮点 ”也在亚太，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法国总统奥朗德 2012 年上台不久就宣布，经济外交是法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他 2013 年 2 月访问印度时，力促印度向法购买 126 架“ 阵风 ”战斗机的谈判，并谈成了法国为印度军队研发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合作协议。两个月后，奥朗德又“ 带了整整一飞机的商人 ”访华，促成民用核能和航空等领域一系列合作。

卡梅伦也在 2013 年 2 月展开任内对印度的第二次访问，努力扩大对印投资渠道，试图构建英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 特殊关系 ”。12 月初，他又率上任以来最大出访团组来到中国，携投资、金融、司法等领域合作文件与经贸大单满载而归。

一年来，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外交成绩斐然，仅与各国达成的合作协议就多达近 800 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合作倡议，成功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

2014 年全球经济外交重要动向

与过去 10 年和 20 世纪相比，2013 年的全球经济外交显现三个重要动向，势将在新的一年里延续和深化。

首先，周边和多双边自贸谈判成为主要国家推进经济外交的重点抓手。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美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抓手就是跨越东西两大洋的自贸谈判，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2013 年俄罗斯一直致力于落实年初生效的《独联体自贸区协议》。继乌兹别克斯坦 5 月正式加入后，吉尔吉斯斯坦 12 月也正式批准这一协议。平安夜当天，普京明确要求在 2014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草案，以便联盟在 2015 年元旦前全面展开工作。这一联盟实即俄罗斯主导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升级版，从地缘政治上看，其前锋直抵仍在试图东扩的欧盟。俄罗斯不惜血本地围绕乌克兰与欧盟“ 拔河 ”，战略着眼点实在于此。

多双边自贸在中国经济外交中地位也大幅提升。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接连访问东南亚，周边外交全面提速，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大幕隆重开启。李克强年内两度访欧，直接推动了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的签署。一年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都在向前推进，中美还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

2013 年岁末传出的一个利好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消息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 12 年来首次达成初步协议。不过，对其意义应有清醒的估计，这一协议避免了多哈谈判立即死，但却不足以确保谈判活下来。就目前成果而言，难以扭转各国聚焦多双边自贸谈判的现状和趋向。

其次，在全球经济外交中，围绕国际贸易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日趋激烈。

时至今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仍远低于他们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但金融危机以来，面对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却表现得更加渴望“ 守成 ”，一心要继续掌控国际经济治理，确保国际贸易规则符合西方利益。这一战略考量，在 TPP 和 TTIP 谈判中展露无遗。两大谈判是全球现有标准最高的自贸区谈判，业界普遍认为可能引领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走向。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 当前有关 TPP 的谈判，体现了美国在投资、竞争政策、劳动标准、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利益。 ”

发达经济体作为既得利益者，希望“ 守成 ”，继续主导国际贸易格局；新兴和发展经济体则希望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更多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以利于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新兴和发展经济体这一要求的正当性质是不容否定的。如果不去除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因素，全球经济的活力与潜力势必难以释放。中国政府已表示，将以开放心态面对 TPP 等各种区域及跨区域自贸倡议，促使各方兼容并包，携手共进；但如何兼容，与谁携手，恐怕还需政策创新。

再次，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特别是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外交最活跃的场所。而中国全面深化国内改革的进程，势必将带动中国经济更大程度的开放，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外交的辐射能力。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年来，不论英法德希等欧洲国家，还是韩澳加新等环太诸国，都把中国作为经济外交的重点目标。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夏访问拉美之际，墨西哥副外长德伊卡萨的表态传递出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更大程度地进入中国市场。 ”

中国政府已把经济外交列为 2014 年外交的一大重点方向。在 2014 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总体构想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创新设计尤为引人注目。这“ 一带一路 ”建设，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 早期收获 ”，而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助于中国构筑坚实的周边经济圈，也将成为联系世界各主要大洲、创造共同繁荣与利益的坚实纽带。

2013 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总体布局逐渐明晰，周边成为重中之重，这也意味着，中日在东南亚之争将更加激烈。面对日本的“ 大把撒钱 ”，中国应保持冷静心态，避免踏入“ 银弹外交 ”、和日本比赛撒钱的陷阱，在经略周边时，更加重视多管齐下地运用综合实力。较之日本，中国在陆地接壤的东南亚占有天然的地利，更有条件在外交领域运用综合实力。况且，日本在东南亚“ 撒钱 ”，包括建设高铁，有助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数年前便指出，中国展开经济外交意义深远，因为经济力量是中国冲破其他大国围堵的最强大力量，经济手段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能造成双赢局面的最重要手段。从经济外交开台来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亦是其他大国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提升经济外交的质量，改善经济外交的策略，通过提升我们的巧实力、软实力、刚柔相济的综合实力，更好地配置和运用外交资源。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学者马特 • 斯顿夫曾经说：“ 外交政策的创新是重大机遇和迫切挑战难得的结合。 ”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创新，时机正在成熟。

新加坡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

□钟开斌

新加坡素以“ 社会稳定 ”著称，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2013 年 12 月 8 日晚，新加坡南部闹市区的印度族群聚居区小印度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新加坡官方和媒体称“ 小印度骚乱 ”）：一名 33 岁印度籍劳工醉酒后在交叉路口与一辆私人巴士相撞后当场不治身亡，引发聚集在附近约 400 名南亚裔外籍工人攻击来到现场的警察等执法人员，导致至少 41 人在骚乱中受伤，16 辆警车和 9 辆民防部队车辆遭到破坏。这是治安良好的新加坡自 1969 年以来发生的第二起骚乱，被称为新加坡“ 四十年一遇 ”的骚乱。事件发生后，新加坡政府依法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仅很快控制现场，也有效掌握舆论场，事件调查也快速跟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依法处置：第一时间迅速平稳控制事态

车祸事故刚发生，新加坡警方依照交通事故来处理，进行伤员救治、事故调查等。不过，当事件演变为骚乱时，新加坡政府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迅速沉着应对事态，依法果断采取措施，使得骚乱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平息，避免了进一步升级和扩大。这种“ 依法应急 ”的观念和行为不仅表现在现场处置上，也体现在对有关人员的后续处理上。

事发后，2 名警察、数名医护人员和民防部队人员迅速到达现场，试图将受害人从车底搬离。此时，2 名劳工带头闹事，一些人拿起玻璃瓶和商店外的花盆作武器，推翻警车。据此，政府紧急调动 300 名警力、民防部队人员，在 2 个小时内控制了局面。警察特别行动指挥处的镇暴队采取驱散骚乱者和控制现场的策略，全副武装，拿起盾牌和警棍，在不同的特定位置列队，向人群同时逼近，成功驱散骚乱者并逮捕涉案者。为防止事态出现反复和反弹，“ 死灰复燃 ”，新加坡警方继续维护现场秩序。截至午夜，现场被封锁，防暴警察仍在现场巡逻。

在现场得到控制后，新加坡警方迅即依法逮捕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员。根据新加坡《刑事诉讼法》第 64 条紧急逮捕规定，对于妨害公务聚众闹事的滋事者，警方予以当场逮捕，并将其交由法庭处置。根据《新加坡刑事法典》第 147 条和第 148 节规定，被指控参与骚乱的被告方可被判处高至七年的监禁及鞭刑；持武器骚乱者可被判处十年监禁及鞭刑；被指控方有权选择认罪或要求庭审，法庭也有权根据警方调查情况决定延长扣押期限。《新加坡移民法令》规定，新加坡有权将那些损害本地利益或影响本地公共安全的外国人直接遣返。9 日凌晨，新加坡警方宣布已逮捕 27 名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员（其中印度裔 24 人），24 人于 10 日被起诉至法院。在审讯近 3000 名外籍劳工后，另 8 名嫌疑人于事发两日后被逮捕。截至 2014 年 1 月，共有 25 名印度籍男子被控参与骚乱，另有 57 名外籍客工因参与骚乱被遣送回国。涉嫌参与骚乱者也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加坡律师公会无偿服务办公室安排律师为滋事者辩护，新加坡外交部也与印度最高专员署接洽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

尽快沟通：有效引导舆论和社会情绪

骚乱事件发生后，社会各方面出现了很多传言和谣言，特别是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负面信息与评论，很多国外媒体也对新加坡的外来劳工待遇、贫富差距、社会稳定等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批评。为此，新加坡政府和高层官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领导人公开讲话等方式进行有效沟通。新加坡官方不仅迅速平息了骚乱现场，也牢牢掌握了舆论场。

一是及时发布事件信息，表达官方的态度和立场。骚乱发生当晚凌晨 1 时 30 分，新加坡召开由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内政部第二部长易华仁、警察总监黄裕喜和副警察总监拉惹古玛主持的记者会，将事件定性为“ 持武器的严重骚乱 ”。新加坡政府高官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安抚外来客工、慰问应急处突力量。凌晨 3 时许，总理李显龙在 facebook 留言，誓言将全力追击肇事者，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当日，总统陈庆炎和多名内阁部长也留言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散播谣言。9 日下午，李显龙向媒体发出声明，宣布内政部将成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呼吁国人保持冷静，向警方提供任何相关信息、照片或视频，祝愿受伤警员早日康复。11 日，外交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用淡米尔语与约 40 名印度籍客工进行了约半小时的对话。在圣诞节前夕，李显龙到警局与 38 名在前线处置骚乱的内政团队人员进行早餐交流会，提振他们的士气。

二是将事件定性为孤立事件，呼吁社会保持冷静。新加坡 540 万总人口中有 100 万外籍劳工，主要从事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不少人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中国。骚乱发生后，有人在网上批评外来劳工，发表排外或针对种族的情绪化言论。对此，新加坡官方呼吁民众秉持负责任和平和的态度，不要煽动排外情绪抹黑所有外籍劳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严厉谴责滋事者的行为，确保警方严厉公正调查，呼吁民众保持冷静。12 日，李显龙结束对韩国访问前接受随行记者访问时表示，“ 小印度骚乱 ”是发生在一个地方的孤立事件，人们不能因少数客工暴乱而认定所有客工都有问题。14 日，李显龙在东盟—日本 40 周年纪念峰会后，针对有人猜测骚乱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客工普遍遭苛待时强调：“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客工遭苛待。这起骚乱属于突发性质和局部性。迹象显示酒精是导因之一。 ”

三是有力回击和澄清国际媒体的不实报道。骚乱发生后，印度 Sun TV Network 电视台进行了错误报道，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立即致函交涉；电视台在 10 日晚上 7 时的黄金时段新闻报道中播放了事件的正确版本。18 日，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针对台湾中天新闻台《新闻龙卷风》节目，就骚乱所作的不实报道发表声明，指节目内容具误导性。28 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有关骚乱是因外籍劳工不满薪资和居住环境所致的报道，30 日又在《国际纽约时报》重新刊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致函报社阐述新方观点，但《纽约时报》却并未刊登这封信函。对此，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 14 日发表声明，批评《纽约时报》的做法。

独立调查：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提出改进措施

骚乱刚一结束，事件的调查工作便迅速跟进。警方在骚乱后展开了广泛细致的调查，动员 500 多名警员展开调查。调查人员在全岛各地，查问了将近 4000 名客工，420 人被带回警局协助进一步调查。因骚乱最初由一名客工遭巴士碾死而引发，警方就调查结果慎重其事，决定委任一名独立专家重组车祸经过，以提供多一方的意见。

鉴于事态严重，骚乱隔天，李显龙下令内政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13 日，由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及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委任的调查委员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数次开会商讨听证会的工作，包括对部分证据进行审查，在 57 名涉案的客工遭遣送回国前与当中 20 名涉案客工进行面谈，与警察部队、民防部队人员、小印度的居民和店主以及涉及意外的巴士司机和协调员面谈等。事件调查将全程接受国会、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调查委员会宣布将在 2 月 19 日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公众在听证会上陈情或者供证，调查结果将在听证会上呈堂。

在调查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的同时，一系列临时性或长期性的改进措施已开始采取。针对骚乱的发生，新加坡政府推出一系列维持安全与治安的临时性措施。例如，因当晚很多闹事者都喝了酒，当局怀疑酒精是肇祸原因之一。因此，新加坡政府宣布实施禁酒令，规定小印度每逢周末、公共假日和公共假日前夕禁止公众在公共场所饮酒；在售酒方面，餐馆、酒店、酒吧和咖啡店等场所周末能售卖酒精饮料，但顾客只能在店内饮用，不允许外带。新加坡当局检讨了小印度私人巴士载客服务，发现一些客工宿舍离小印度较远，往来载客时间长，陆交局决定逐步增加巴士数量。同时，新加坡也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外籍员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公正水平、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等根本性问题。例如，政府已责成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领导的跨部门委员会，负责探讨客工群体对新加坡人的影响和客工福利两大课题。

◆环球瞭望

日本“ 水俣病 ”之灾留下的遗产

□周幼曼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战后的全面复苏和高速发展时期。蓬勃发展的工业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一时期，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公害事件频繁出现，民众健康受到巨大威胁。在影响较大的日本“ 四大公害病 ”中，“ 水俣病 ”被公认为日本战后之最大公害。

“ 水俣病 ”实际为有机水银中毒，是患者长期食用被有机汞化合物污染的鱼类等食物造成的，因 1956 年首先发现于日本熊本县水俣市而得名。1966 年新潟又爆发“ 水俣病 ”，被称为“ 第二水俣病 ”。这两个地方“ 水俣病 ”的罪魁祸首是直接排放有毒废水的当地工厂。“ 新日本窒素肥料株式会社 ”设立在水俣市的工厂将生产氮肥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水直接排放入渔民常年捕鱼的海域，人们捕食受污染的海产品造成有机汞在体内聚集，引起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手足麻痹，步行困难，甚至出现失智，听力、言语及运动障碍。

相关工厂最初隐藏真相，推卸责任，千方百计阻碍研究人员入厂取样，以安装完全无效的所谓废水净化装置欺骗民众，照旧排放污水。直到发现首例“ 水俣病 ”患者 12 年后的 1968 年，日本政府才承认并公布“ 水俣病的起因是氮公司工厂废水中所含的甲基汞 ”。在这漫长的 12 年间，由于没有及时应对，工厂排放的包括甲基汞化合物在内的汞量大约又增加了 80~150 吨，新的受害者不断出现，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日本在当时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这是“ 水俣病 ”之灾爆发的根本原因。日本为治疗和赔偿患者以及修复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但“ 水俣病 ”没有根治的方法，“ 水俣病 ”幸存者至今仍生活在痛苦中。熊本和新潟的两场“ 水俣病 ”，以及富士县“ 痛痛病 ”、四日市哮喘病等成为日本民众挥之不去的噩梦。惨痛的代价使日本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日本政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从各方面着手治理和保护环境。

加强环保立法。196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基本法》，并于次年获得通过，把大气、水源、噪音、震动、地震、恶臭等污染确立为公害。1970 年召开“ 公害国会 ”，又将土壤污染增补为公害，并制定和修改了 14 个防治公害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公民各自的责任和义务。1993 年和 1994 年日本还先后颁布《环境基本法》和《环境行动计划》，确定了“ 减少对环境的负担，实现循环社会系统 ”“ 确保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生存 ”“ 在公平的职责下实现所有主体的参与 ”“ 推进国际性协作 ”的四项基本原则，以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完善公害诉讼制度和受害者救济体制。1970 年日本颁布了世界第一部环境刑法《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确立了以特别刑法为核心的环境刑罚体系，开创运用刑法保护环境之先河。1973 年颁布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确立了“ 公害健康被害补偿制度 ”。该制度的主要作用是追究环境肇事者的民事责任，对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处以巨额罚款。罚款所得收入用于赔偿受害者，并开展福利事业。这些法律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永久性地改变了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促使他们在生产经营中重视环境保护。同时，将环境污染内化为企业生产成本后，也促进了企业不断研发节能减排新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盈利水平。时至今日，日本企业的环保理念和技术都处在世界先进水平。

完善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日本逐步建立了严密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从中央一直深入到企业。在中央层面，日本于 1971 年成立环境厅，集中处理与环保相关的事务，改变了之前分散式管理造成的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的局面。日本还成立了环境审议会和公害对策会议，其中环境审议会是相对独立的环保咨询机构。进入 21 世纪之际，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在地方层面，各地也都成立了专门负责环保的政府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企业设置环境管理员，负责对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确保其符合环保标准。环境管理员需通过严格专门的考试和资格认证，上任后的要求也很严格，若其严重失职，可能面临刑法处置。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先进的环保技术。1974 年日本出台《产业结构长远规划》，“ 节约资源、环境保护 ”成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规划提出，建设“ 福利型、生活保障型产业结构；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型产业结构 ”，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国际协调。从此，日本的产业结构开始通过科技引进和自主研发逐步升级，从战后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升级到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能源方面，注重“ 低污染、无公害 ”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重点加强节能技术和能源加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能源结构从高硫燃料向低硫和脱硫化升级。

日本还十分重视环保技术的研发，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带动了一系列高新产业的发展，成为日本的一大经济增长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水俣市和新潟县都建立了有关“ 水俣病 ”的资料馆，让人们了解和铭记“ 水俣病 ”的惨痛教训，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目前，优美的生态环境使日本成为全球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回顾当年的“ 水俣病 ”之灾，日本变化之巨令人感慨。2013 年，联合国通过了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俣公约》，日本“ 水俣病 ”的教训和治理环境的经验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遗产。